

贵州毕节，深处西南腹地，北临蜀水、西拥滇山，是川、滇、黔三省的交通要冲，九山半水半分田，一度被视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石旮旯。这里是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位于黔西北乌江源头乌蒙山区又是典型岩溶山区的毕节来说，如何啃下贵州省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中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摆脱经济落后、生态恶化、人口膨胀，人民生活十分艰难的状况，避免陷入“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怪圈，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如何破解难题？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作出“为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闯出一条新路子，同时也在多党合作服务改革发展实践中探索新经验”的重要指示，这为毕节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小康指明了前进道路。2015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由于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到2015年，毕节农村贫困人口占贵州省的23.4%，是全省农村贫困人口最多的市。要在短短5年之内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不可谓不艰难。

党中央统筹安排，多方助力战贫困

脱贫攻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凝心聚力、排除万难，驰而不息推进，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向前。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聚力攻坚克难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解决脱贫攻坚这样的大事难事。毕节的脱贫攻坚，正是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形成脱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的生动实践。

作为全国唯一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为主题的试验区，在建立之初，根据党中央的安排部署，由全国统一战线对口帮扶毕节。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有关领导以及专家顾问组不辞辛劳奔赴毕节，跋山涉水，走村串户，为村里的脱贫攻坚出谋划策、殚精竭虑。从帮助加强小学、初中、高中教育，到培训农民工、农业科技人才；从引资建设乡卫生院、村卫生室，到解决人畜饮水问题、改建贫困农户房屋；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文明家园建设，到发展特色产业……毕节脱贫攻坚需要什么，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就关注、支持什么。统一战线广泛凝聚各方智慧力量，不断丰富多党合作基层实践，为毕节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毕节市大方县穿岩村的生态建设，就是其中一个例证。“九里黄河路穿岩，天晴下雨穿草鞋。天晴晒破坡脑顶，下雨刚去半匹岩”。20多年前，穿岩村是水土流失的重灾区，穿岩村

从苦甲天下到同步小康

——贵州省毕节市脱贫攻坚的实践探索

□ 本报记者 黄珊

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取得这一系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深

刻总结新时代伟大实践经验，讲好新时代实践故事，特别是讲好新时代伟大实践背后的思想理论以及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推进伟大事业，不断取得新时代伟大成就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学习时报自本期起开设“新时代实践故事”栏目，聚焦新时代脱贫攻坚、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等，深入揭示各领域、各地方新时代实践探索成果及其背后的理论逻辑。

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发扬革命加拼命精神

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发挥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形成外部多元扶贫与内部自我脱贫的互动机制。“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毕节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注重发扬干部群众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引导贫困群众依靠勤劳双手和顽强意志摆脱贫困、改变命运。

海雀村位于毕节市赫章县河镇乡，地处乌江上游，平均海拔2300多米，曾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战场，聚居着彝族和苗族群众。20世纪80年代，海雀村由于地处喀斯特山区，土层薄，养水不易、固土艰难，水土流失严重，石漠化问题突出，百姓年人均纯收入只有33元。当地有句顺口溜：“海拔两千三，人均三十三；山上光秃秃，家里无吃穿”。

海雀村的老支书文朝荣意识到村民贫困的根源是荒山，决定利用政府免费提供树苗的机会植树造林。村民忙着干农活，压根儿没闲心种树。于是，文朝荣白天干农活，晚上挨家挨户动员群众种树。在文朝荣的号召下，300余名青壮年每天冒着严寒挖树窝、种树苗。百余公里的运苗路上，山路泥泞，大家风雨无阻。文朝荣经常三更半夜把洋芋煮好，第二天一大早背上山，给大伙分吃；看大伙实在太累了，他把为女儿坐月子准备的鸡蛋也拿了出来……

文朝荣带着村民在万亩荒山秃岭

上植树造林，大家拿起锄头，背上背篓，上山种树，多年如一日，在上百个山坡种上1.2万亩华山松、马尾松。从村支书岗位上离任后，文朝荣担任义务护林员，精心呵护山林，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去世。文朝荣被中央组织部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被中宣部追授“时代楷模”称号。

一片绿海，三代传承。如今，儿子文正友和孙子文均福从文朝荣的手里接过担子，继续带领群众守好山林，大力发展致富产业。村里的森林覆盖率从最初的不到5%提升至77%。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村民因地制宜发展起中药材、食用菌、旅游等产业。村民祖祖辈辈守着的大山，不再是贫穷的根源，而是变成了“幸福不动产”和“绿色提款机”。

文朝荣是党员干部队伍中涌现出的杰出代表，他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愚公移山、改变面貌、造福子孙的精神，生动体现了广大干部群众在毕节脱贫攻坚过程中的干劲和冲劲。2020年，毕节市共有1125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组建了2219个工作组，深入120个深度贫困村和贫困发生率较高的村，采取“点面结合、上下联动、分级挂牌、责任到人”的方式发现和解决存在的困难问题。上下一心、左右发力，千群一起想办法、找出路、动脑筋，携起手来激发“1+1>2”效应，顺利推动脱贫攻坚进程。

毕节干部群众发扬革命加拼命精神，发扬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精神，人之一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干出了一片新天地。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毕节19人获先进个人、15个集体获先进集体，成为全国

受表彰数量最多的地级市。毕节脱贫攻坚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他们当中包括乡党委书记、村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定点扶贫挂职干部、支教教师、加工坊负责人、矿山救护队长……这些人数年如一日奋斗在山村里，倾力奉献、苦干实干，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过在一起、干在一起，将最美的年华甚至生命奉献给了脱贫攻坚事业。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百姓吃上了“生态饭”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将毕节试验区成立30年来的扶贫实践肯定为“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一个生动典型”，同时要求锐意出战、务求精准，确保毕节试验区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在新发展理念和精准扶贫方略指引下，毕节找准发展思路，因地制宜选择发展特色产业，切实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把生态“含绿量”转化为发展“含金量”，推动了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实现了脱贫攻坚与生态建设相得益彰，走出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

化屋村位于毕节市黔西市新仁苗族乡，是乌江南北两源的汇合地，原

名意为“悬崖下的村寨”，曾因悬崖峭壁阻隔而成为深度贫困村。以前，想走出村子，要么划竹筏沿江出去，要么徒手翻过上百米的悬崖，当地百姓称之为“手扒岩”，一不小心就有掉下去的危险。不少村民以渔为生，经常带着渔具和网箱辗转于乌江上、中、下游，网箱养殖超载、饲料投放过量让乌江不堪重负。再加上沿岸磷化工产业的粗放生产，乌江被污染成“牛奶河”，江水变成乳白色，散发出腥臭味，百姓见了直摇头，称之为“污水”。

山是“手扒岩”，水是“污水”。百姓靠山靠不住，靠水靠不住。山穷水尽疑无路，如何才能走向“柳暗花明”？当地政府下大力气治理磷化工污染，全流域取缔网箱养鱼，推进乌江流域水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打了一场治污治渔的漂亮仗，千里乌江复清流。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支持下，毕节实现了“村村通硬化路、村村通客运”。针对化屋村的实际情况，政府给村里修了路、建了房，还搞起了旅游业。为了发展乡村旅游，新仁至化屋村的旅游公路建成通车，2022年新建成了2.7公里的休闲沿江步道。

依托独特的山水风光，化屋村乡村旅游越来越红火，村民办起了农家乐、小卖部，还发展起生态养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转化为生动现实，越来越多的村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是和以往完全换了吃法，吃上了“生态饭”。

生态好了，旅游火了，产业旺了，经济就“活”了，村民干劲更足了。如今，村里的扶贫车间越来越大，苗绣产品远销全国各地；黄耙加工厂把传统特色美食做成产业，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化屋村同全国其他脱贫村一样，大踏步行进在奔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经过艰苦卓绝的脱贫攻坚战，2020年毕节全部如期脱贫，跨越了贫困的“乌江天险”。毕节7个县脱贫摘帽、1981个贫困村如期出列、207.04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6年的7668元增长到2021年的12441元。这些数字背后，是一间间房、一条条路、一个个致富产业、一次次教育资助、一份份医疗保障和一张张笑脸。毕节贫困山区绝处逢生，实现了从苦甲天下到同步小康，彻底撕掉了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标签。如今的毕节，实现了人民生活由普遍贫困到全面小康、生态环境从不断恶化到明显改善的重大跨越。对于习近平总书记“为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闯出一条新路子”的重要指示，毕节干部群众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依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坚持新发展理念指引，交出了一份脱贫攻坚奔小康的合格答卷。

新时代 实践故事

在于引领时代思想的力量

□ 刘同舫

思想具有强大伟力。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思想体系，具有兴党强国伟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思想的引领。新时代新征程，更加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伟力。

面对“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主线，直面“领悟思想的力量”的主题，人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样的思想才能呈现出强大伟力？总结人类进步、世界历史、时代发展、人民实践和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经验教训，我们可以从历史、人民、实践、国家和政党“五维框架”来理解和把握。韩庆祥教授在新著《领悟思想的力量》中作了回答。一是从历史维度，这种思想能把握历史规律，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掌握历史主动，推动历史发展，因而是一种科学的思想，是“对”的思想，能呈现出真理的力量。二是从人民维度，这种思想能把握人民愿望，维护人民利益，站稳人民立场，掌握人民群众（或为人民群众所掌握），造福人民群众，因而是一种为人民立言的人民的理想，是“好”的思想，能呈

现出道义的力量。三是从实践维度，这种思想源于实践创造，立足实践基础，经过实践检验，注重自我完善，引领实践发展，因而是一种注重创新且行动着的思想，是“活”的思想，能呈现出实践的力量。四是从国家维度，这种思想能反映时代呼声，站在时代进步一边，解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问题，满足国家发展需要，因而是一种先进的思想，是“兴”的思想，能呈现出推动的力量。五是从政党维度，这种思想能体现“两个结合”，创立思想的主体具有人格魅力和积极影响，能走向人性深处，叩击人们心灵，能成为引领权力和资本的思想武器、行动指南，成为做好工作的看家本领，因而是一种为人们所喜爱、所认同的正确思想，是“行”的思想，能呈现出引领的力量。就中国而言，这种思想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为马克思主义谋生机。

科学的思想之所以具有强大伟力，从根本上在于它是对历史发展规律、时代发展趋势、实践发展要求、人民美好愿望的正确反映，反过来它又指引历史、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古代，世界文明的中心在中国。近代，

世界文明的中心转移到欧洲。由此兴起了“欧洲中心主义”，随后进一步拓展为西方中心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及其思潮，西方中心论在整个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思想认识上不断清算自己以前的哲学信仰，不断进行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所以晚年马克思超越了青年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道路的思想认识，开始从思想意识上强调并关注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尤其是东方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问题。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话，列宁则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这种现实，就是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需关注的是，俄国是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列宁晚期从理论和实践上集中思考的根本问题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这种思考形成了思想，其焦点和根本点，一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上改变了；二是列宁认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显然，是列宁开启了对历史发展道路

多样性的实践，开始走出了“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要言之，历史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实践真正发端于列宁，它在思想理论上为中国“走自己的路”提供了实践样本。

现代化运动是西方开启的，它把整个世界卷入其中，也对产生强烈冲击，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共同的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1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从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选择正确中国道路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由之路等三个方面，开始掌握在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历史主动。之后，我们党确定了“走自己的路”，推进现代化道路问题上的“自主性成长”；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赋予“走自己的路”以时代内涵，从“走自己的路”中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了现代化道路问题上的“内涵式成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进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置于世界历史这种大历史观、大历史场景中进

行思考，在与西方现代化的比较和竞跑中，又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进一步推进现代化道路问题上的“世界性成长”；之后，我们党又进一步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成功推进和拓展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更为宽广、更为深远的意义，进而推进了现代化道路问题上的“理性性成长”。概言之，基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生成，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由“世界失我”到“世界有我”再走向“世界向我”的历史演进逻辑，使新时代的中国走出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确立并巩固了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思想主体性，也使我们真正明确一个道理哲理：一切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之争，归根到底是某种思想“主体性”之争。

（作者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